

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 历史、模型及展望

陈巍¹, 潘威², 黄家裕³

(1.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浙江 杭州 310028; 2. 南京大学 远程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3.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非暴力是一种旨在通过影响他人来实现某一目的,同时排除了直接伤害那些妨碍实现该目的的反对者的行动。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并伴随和平心理学的兴起而备受关注。目前具有影响力的非暴力的心理学理论模型主要包括:Kool的非暴力的三维模型、Teixeira的整体的非暴力模型以及Brenes的和平自我模型。未来研究应加强跨领域的整合,重视方法论多元主义,编制本土化的非暴力测量工具,将实证研究的结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并强调生态与文化批判意识。

关键词:非暴力;和平心理学;理论模型;无杀生

中图分类号:B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77-08

一、引言

“非暴力”(nonviolence)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圣贤苏格拉底有关“遵守法律是一项道德义务”的信念,他本人甚至因为这一信念而献身^[1]。然而,正如著名和平心理学家Mayton指出的:“非暴力看似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概念,但事实上它却异常微妙与复杂”^[2]。这是因为,从群体心理层面上来看,非暴力是一种对暴力或侵犯行为的克制。它是一种不诉诸战争来寻求和平的方式,有着丰富的历史性和演化性的特点,并已经呈现出极具全球化性质的趋势^[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暴力行动是由印度政治家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Nonviolent and Non-cooperation Movements)与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直接行动”(Nonviolent Direct Action)。从个体心理层面上来看,非暴力的实现需要个体具有承担风险和忍受痛苦的觉悟,它除了包含“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不杀生”(ahimsa)、“苦行”(tapasya)与“不伤害他人感情”等戒律式的消极意义外,还存在着积极的含义,即要求人们坚持真理、主动自觉地去爱。以此原则来解决冲突的非暴力不受种族、国家、社会阶级或者性别等方面的限制,直接面对暴力或反抗,超越普通制度化的政治策略水平且避免对反对者造成伤害^[4]。当前普遍接受的非暴力的心理学定义是:“一种旨在通过影响他人来实现某一目的,同时排除了直接伤害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反对者的行动”^[1]。一直以来,非暴力都是古今学者思考和探究的课题。近几十年来,伴随和平心理学的兴起,关于非暴力的研究也正在不断的丰富,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大量研究表明,非暴力能

* 收稿日期:2013-02-17

作者简介:陈巍,心理学博士,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当代认知科学研究”(11CZX006),项目负责人:黄家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自然化的交互主体性研究:神经现象学的进路”(2013M540497),项目负责人:陈巍;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自然化的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研究”(13NDJC172YB),项目负责人:陈巍。

够在冲突解决、人际沟通、和平教育和社会公正、社会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5-9]。本文首先尝试厘清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发展史,随后着力介绍当代和平心理学视野下非暴力的三种心理学理论模型。通过详尽分析这些理论之特点,旨在对目前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前瞻了该领域未来研究中所应注意的问题,以期增进我国心理学界在该领域的必要关注。

二、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发展史

长久以来,心理学在发展、提升和评估公共政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对于世界和平和社会公正方面则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10]。早期的心理学关于非暴力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处于哲学思辨层面。例如,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和首位和平心理学家的詹姆斯就曾讨论过战争和其情感对人类的影响,他鼓励心理学研究者探索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处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恐慌^[11]。精神分析运动的领袖弗洛伊德则从精神动力学的层面解释了死亡本能(thanatos)会驱使个体产生攻击性行为,但自我防御机制中的升华机制(sublimation)又会对这些暴力行为施加影响,形成更合理、更具适应性的非暴力行为^[12]。埃里克森则进一步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甘地的早年经历进行了剖析,以期揭示潜意识与非暴力心理起源的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13]。

随后,心理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开始盛行,对非暴力行为的关注也逐渐被探索暴力攻击行为的成因及其干预所取代。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从行为主义的角度阐释了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他通过实验发现观察学习这一特殊的学习方式,从而推论人们学会暴力行为就像学会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凭借直接经验或者观察学习得来的^[14]。在此基础上,Buchman和Funk从认知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暴力行为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暴力示范会减少模仿者对受害者的同情并使其更倾向于把周围世界看作是充满危险的地方,这种不当的认知方式会直接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15]。Berkowitz从现代神经科学理论和联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当人们反复接触攻击行为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就会产生愈趋详细的相互联结的攻击性思维网络,接触攻击行为可以引发相关情感及与攻击有关的技能、信念^[16]。此外,Anderson和Bushman在整合了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科学的联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侵犯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该模型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记忆中与攻击相关的知识结构的活动的活动的影响^[17]。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理论都认为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历是个体暴力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这些后天形成的暴力行为是能够通过干预加以改变的。

伴随研究的深入,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单纯从个体层面上的行为与认知解释忽视了暴力与非暴力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他们试图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对民族冲突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和相互依存观点(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接触理论认为在民族接触与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其基本思路是,在对抗的社会群体中,个体之间的接触会倾向减少民族和文化的冲突,从而减少他们相互所具有的消极刻板印象,最终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相互间更多的平等交往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18]。相互依存的观点主要是依据对历史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发现种族间的暴力很少出现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因此,抛开个体的差异,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将会是预防群体暴力的一个极其有效的策略^[19]。

自和平心理学(Peace Psychology)诞生之后,以关注世界和人类自身和平与和谐为己任的和平心理学家赋予了非暴力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专题性的地位。他们试图从非暴力的角度分析个体的行为机制以及个体与人际互动对于促成和平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平心理学发源于冷战时期,当时的一批心理学家试图将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用于阻止核战争的爆发和分析政治策略,并且据此宣称自己是和平心理学家,但他们依旧来自传统心理学领域(包括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此时的和平心理学仍处雏形阶段。直至1986年,White出版《心理学与核战争的预防》(Psychology and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才在书中划定了和平心理学的基本研究内

容。最终,在1990年,和平心理学获得了制度上的认同,成为APA第48分会。分会现任主席为美国Clark大学的Joseph DeRivera教授,官方期刊为《和平与冲突:和平心理学杂志》(Pea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和平心理学分会的宗旨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促进世界范围内所有民族,团体和家庭的和平。这里“和平”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对于战争的抵制,还包括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将冲突降到最低并且更加有利于人的发展^[20]。分会的主要功能是鼓励有关和平问题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一个有利于研究者交流和平问题的平台,以及促进心理学知识在和平建设中的运用。在追溯心理学思想渊源方面,Rudmin总结了詹姆斯、弗洛伊德、托尔曼等17个早期心理学家对和平研究的贡献,认为他们是和平心理学的先驱^[21]。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和平问题的研究取代战争和政策问题的研究转而成为和平心理学的焦点领域,而非暴力作为获得和平的重要手段已然成为和平心理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22]。

三、非暴力的心理学理论模型

近二十年来,和平心理学家Kool、Teixeira和Brenes等人相继提出了较系统的非暴力的心理学理论模型。非暴力三维度模型是在对非暴力运动形成过程中的个体行为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模型理论,其试图解释个体在非暴力运动中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当权者或反对者可能做出的反应。相对而言,后两种理论着力于分析个体层面和人际层面的影响力在非暴力行动中的体现,主要思路是阐述非暴力在个人和团体发展中发生的诱因与蕴含的影响力。这两个理论尤其重视将这些诱因与影响力嵌入到一个更为宽泛的个体、人际与自然层面进行考察,从而渐露出当代积极心理学与生态心理学的理论特性。

(一)非暴力的三维度模型

Kool在继承了詹姆斯与托尔曼等人心理学研究中所推崇的友爱性的基础上,结合了Sharp关于非暴力的政治理论,提出了非暴力的三维度模型(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Nonviolence)^[23-25]。Kool首先区分了非暴力行动(acts of nonviolence)和非暴力行为(nonviolent acts)。非暴力行动本质上是无条件的,可以成为暴力的替代物,这些行动的用途是尝试证明替代暴力的沟通是可能实现的,也可以用来避免伤害反对者。此外,突出显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目的,即用来解决在那些将侵犯或者暴力视为合理反应的地区中存在的冲突。例如联合抵制或示威游行。非暴力行为不同于非暴力行动,因为这些行为不使用暴力,是正常的行为模式。例如,照顾动物和抚养儿童^[23]。Kool认为非暴力行为一般都是那些会产生积极结果并符合社会满意度的日常行为,而非暴力行动则有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结果。例如,消费者对某些商品的联合抵制会使得商家利润减少从而影响员工的薪水^[24]。此外,非暴力行为往往是不明显的,因为正常的社会期望是我们本该在日常活动中遵循这样的行为。正如James曾指出的,我们必须做出非暴力行为,这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26]。

在吸收了皮亚杰、科尔伯格、吉利根以及埃里克森等关于道德发展的研究的基础上,Kool将非暴力置于一个三维空间之中。这三个维度分别为:道德关怀(moral concerns)(高或低)、侵犯(aggression)(高或低)与影响力(power)(他人或自我)。Kool认为一个完整的非暴力理论应该研究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其中,道德关怀的维度又包括公正(justice)和关怀(caring)两个极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高水平的道德关注是一种类似格式塔(Gestalt)的概念,包含了高度的原则性、关怀和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并且也涉及到功利的问题。一个高关怀和低公正的个体会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而高公正与低关怀的个体则会尤其关注公平、公正的规则。相比之下,高公正和高关怀的个体将会倾向选择公正且富于同情心的方法并依此行动。影响力即指影响其他行为者的能力,尤其是与非暴力相关的“整合的影响力”(integrative power)。这种影响力来自于追随者给予处于强势地位的非暴力领导者的信任和善意。当非暴力的个体尝试通过道德行为达成社会和谐的时候,他们在该过程中表现出的整合影响力,可以影响暴力犯罪者的良心,从而促成冲突的解决。进一步

的,影响力又可以分成自我取向(self-oriented)和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两个极点。那些反映出与他人分享影响力且不仅仅基于自我满足(self gratification)的影响力的行动往往最能彰显非暴力^[23,2]。因此,在 Kool 的模型中,非暴力的个体处于四方体右象限的底部,表现出了低侵犯和高道德关注以及他人取向的影响力^[1]。如图 1 所示。在此基础上,该模型企图通过对非暴力行动者行为的分析来对反对者或者统治者的反应做出可能的推测。当然,由于 Kool 的模型重视结合侵犯、道德和影响力等相关的认知成分,但是一旦该模型中道德关注的定位面临效度等问题时,这些成分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该模型中需要反思与改进的部分。近来,Kool 依据自己的理论编制了非暴力测验(Nonviolence Test),对易于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个体进行测量,并对测验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理论的实证支持^[24]。

(二)非暴力的整体理论

Teixeira 的非暴力的整体理论(Holistic Theory of Nonviolence)具有极强的超个人心理学倾向^[2]。在 Teixeira 看来,非暴力是由行动组成的,并在排除有害意图的同时强调意义和行动结果的协调。因此,非暴力是优越于暴力的。非暴力是一类世界范围内跨越时代、文化、价值取向的事件,也是一种应对多民族、多元文化与多信仰社会中的真实冲突的实践方式。具体到个体层面上,非暴力并非只限于身体层面,而是牵涉到人类体验与行为的心智、情绪、形而上学与精神层面。与有关非暴力的理论更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体内部,而是需要一个基于个体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视角^[27]。

Teixeira 认为,在个人内心(intrapersonal)的维度上,非暴力行为可以发展和提高自尊,认可自身的意义、价值和力量。在人际的维度上,自尊涉及了对他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同时包含了我们关于朋友和反对者的观点。在更大的范围中,Teixeira 进一步将非暴力延伸为一种感知以及思考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的方式,并且呈现了一种超个人的或者精神上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正是某种超个人的或精神性质的原因使得非暴力的实践者愿意并且能够忍受痛苦,而不是伤害他们的反对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与很多研究者不同,Teixeira 承认愤怒情绪在人类互动中存在的必然性,强调非暴力并不否认自然产生的愤怒,而是希望将此由情绪经验所产生的力量引导向一种尊重的、预防性的和积极改变的方面。因此,该理论模型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将愤怒视为促进变革的积极因素,认为非暴力是愤怒情绪的平和释放方式。此外,Teixeira 提出,处于社会批判水平的非暴力的目的是形成多元化社会。经由非暴力的社会变革过程应该重视对于社会边缘成员的包容。当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或被忽视群体的需要受到关注的时候,这些被排斥的群体可以被动员进具有自我意识的非暴力团体,从而辅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更加完善的变革。同时,当这些边缘群体在积极地推动非暴力的时候,也能够推进社会反映它自身的信念和价值。这种信念和价值可以引领它所服务的团体,这将对社会发展水平产生具有变革性的影响^[27,2]。

Teixeira 的非暴力的整体理论可以用一种循环的模型加以呈现。如图 2 所示。在此模型中,中央的核心价值是从中心出发按由内向外的顺序与个人方面、人际关系以及与非暴力相关的社会系统相互关联的。当从非暴力理论走向非暴力实践的时候,在 Teixeira 的模型中有一个预防性的方面。外圈反映了那种鼓励其成员之间的暴力或非暴力的社会系统,其中的儿童培养实践、教育系统、社会的奖励构成以及冲突解决的策略是鼓励的标准,这些标准用来影响处于个人内心、超个人和人际水平上的个体关系^[2]。在最终目标上,Teixeira 提到,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非暴力的未来,我们必须引导社会所产生的压抑。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走向毫无偏见、没有歧视的社会,并且以对人类多样性的欢庆来取代它们。在 Teixeira 模型的实践中还涉及到一个附加的方面,是指在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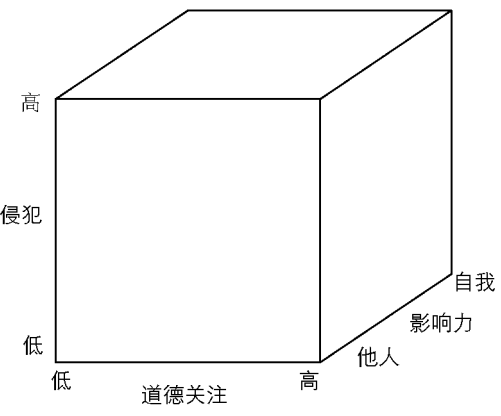


图 1 Kool 的非暴力三维度模型(Kool, 1993)

过程中积极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27]。

(三)非暴力的和平自我模型

与 Teixeira 的非暴力的整体理论模型几乎同时提出的还有 Brenes 的非暴力的和平自我模型(Model of Peaceful Selfhood)。该模型主要关注在共同体层面上普遍的和平责任,这包括与自我的和平、与他人的和平以及与自然和平三者间的交织^[2]。在此基础上,Brenes 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需要哪种类型的人来推动文化的和平。在此模型中,和平处于同心圆的中央,向外延伸出三个独立的主题:和谐的身体(peace with the body)、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和自然平衡(natural balance)。当从模型的中心移向外圈时,在每个水平上都有相关的价值,而且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来实现这些价值^[28]。如图 3 所示。

和平自我模型将自我和平的表现划分为和谐的身体或身体和平(peace in the body)、内心和平(peace in the heart)以及精神和平(peace in the mind)三个水平。身体和平包括:身心和谐、需求的意识以及合理地使用令人满意的物品。内心和平包括:和谐、爱与同情心、容忍。精神平和包括:自尊、自我实现与自主^[1]。这三个水平充分考虑到了非暴力或者自我和平的三个必要的转向,它们分别是:(1)平静(equanimity)(以平等意义上的仁爱对待所有人的能力);(2)自我和他人的等同(equality of self and others)(由自我本位的导向转向一种更集体的导向);(3)奉行利他的生活实践(commitment to altruistic life practices)。Brenes 的和平自我模型的第二个区域是与他人的和平。主要关注来自民主观点的社会公正是通过责任的价值、团结以及参与推进共同利益来实现的。在社会之内包含的大量期望是和平文化将会保障个体自身的健康状态和经济安全。该模型的第三个区域是处理与自然的和平以及处于和平文化之内的自然平衡。他认为守恒的价值、宇宙的同一体性以及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在此可以导向一个生态学的觉悟和道德的牢固支点^[2]。Brenes 进一步指出,非暴力是冲突解决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可行途径是个体以自己关于公正的理由来说服其反对者。它主要属于模型中与他人的和平的区域^[28]。此外,在模型中与自我的和平这个区域中也会存在着非暴力的个体,并且,爱和同情心连同自我实现、内心和谐以及自发的利己主义在此部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对前两个模型而言,Brenes 的和平自我模型的特点在于其更关注一个推动和平的个体应该是怎样的个体,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非暴力的个体。该理论焦点在于凸显出非暴力带领人类走向和平的价值是通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及其与自然的平衡这三个层面的意义而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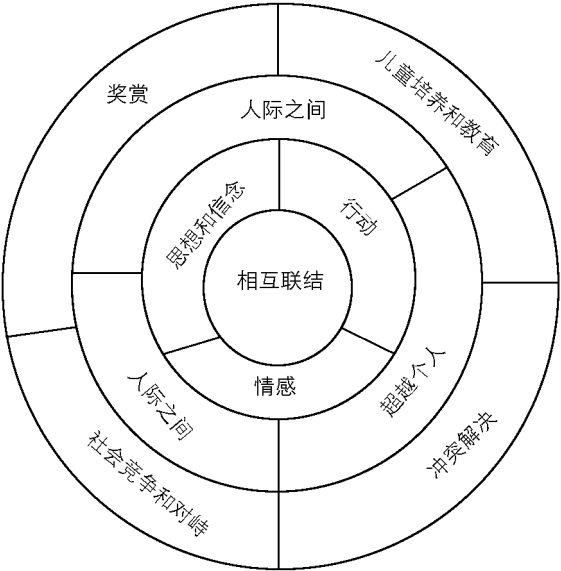


图 2 Teixeira 的非暴力的整体理论模型 (Teixeira,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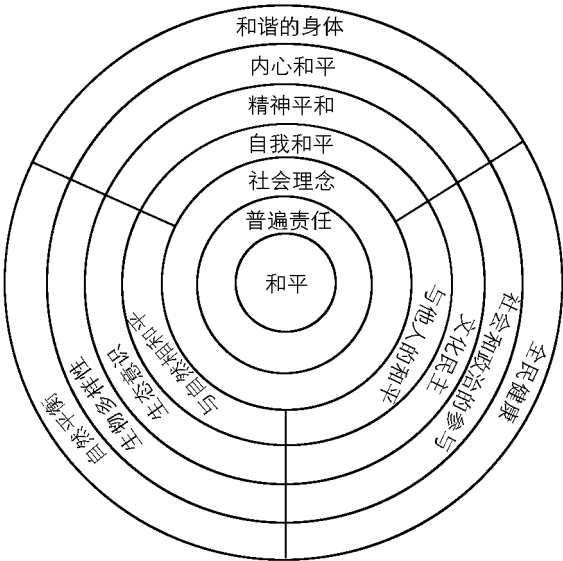


图 3 Brenes 的和平自我模型 (Brenes, 2004)

四、展 望

总体来说,非暴力作为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对旨在促进人类和平和个体自身和谐的和平心理学而言,非暴力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然而,目前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数量少且琐碎,没有得到系统的整合,相关的理论模型也由于匮乏实证研究的支撑而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拓展与深化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

第一,继续加强社会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和平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跨领域整合。和平心理学视域下的大多数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已经形成的非暴力的行为表现与人格特质,而较少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与后天教育在塑造和影响非暴力行为上的作用与发生方式。相对而言,已有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研究试图从社会和学校教育角度探讨非暴力的培养及其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例如,Weber 分析了非暴力在和平相关的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29]。Farrell 和 Erwin 等通过质性访谈研究了美国和非洲等国的青少年在同等条件下个体因素对于非暴力行为和打架行为的影响^[30]。Cavanagh 等探讨了学校中非暴力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了学校中非暴力与和平文化的生成,并发现信任关系的培养、理解能力的差异性、环境的安全性等条件对非暴力氛围的影响^[31]。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国际性的军事冲突、恐怖主义、种族与性别歧视等研究主题来深入探索非暴力思维的启动机制(priming of nonviolent thoughts)^[32]、影响因素及其跨文化特征。有迹象显示,社会心理学与和平心理学的联姻正在形成一股新的趋势,即“社会心理学的和平研究”(social psychological peace research, SPPR)^[33]。由于积极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的观照离不开个体平静(personal serenity)与内心和平(inner peace),而非暴力行动无疑是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最佳实例。因此,积极心理学与和平心理学在很多方面有着同样的诉求^[34-35]。此外,近年已研究考察了暴力行为的脑与神经基础。例如,伏隔核的激活与暴力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冷酷无情特质的神经心理学机制等等^[36-37]。最近,Kool 在整合神经科学证据的基础上提出,非暴力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适应性行为具有优势,而催产素(oxytocin)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倡导在这几大领域内建立起联系来深化对非暴力的认识^[38]。例如,探讨 Kool 的模型中非暴力个体的人格特质与宽恕(Forgiveness)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究 Brenes 的模型中自我和平的个体在脑与神经层面上的特异性等等。

第二,重视方法论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使用诸如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质化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非暴力研究的第三人称视角缺陷。心理传记学是将心理学的概念和原理应用于传记的研究,并且把个人生命的发展历程转换成连贯且具启发性的故事,从而深入认识个体的方法^[39]。它对于理解与个体相关的概念与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暴力的理念或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个体体悟与经验,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烙印,这恰恰非常适宜于运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埃里克森对甘地人格的精神分析就大量运用到了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近期,也有研究借助话语分析法来分析非暴力取向与暴力取向的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差异^[40]。

第三,结合上述理论模型,编制本土化的、规范的、信效度合格的非暴力测量工具。非暴力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没有暴力和侵犯的途径,这种途径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编制出各种评定个体非暴力倾向的测量工具^[41]。例如,非暴力自我评定问卷(Nonviolence Self-Inventory),用于人们对自己的非暴力和暴力行为进行自我评定的^[42]。非暴力关联问卷(Non-viol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用于测量人们与合作者的沟通形式及其对于沟通中非暴力的认知等^[43]。这些测量工具有助于个体了解自身的行为模式中非暴力的倾向和对暴力的排斥程度,对于调控群体推动积极的和平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4]。然而,这些非暴力的测量工具与当前的理论模型间存在着脱节,这必须引起必要的重视。此外,非暴力斗争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与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有关亚洲国家、民族与群体的非暴力测量工具开发却相对滞后。因

此,通过编制本土化的非暴力测量工具来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或提出新的模型也是有待开展的课题。

第四,从当前的研究模式中可以发现,大量有关非暴力的心理学研究依旧停留在理论与思辨水平上,实证与应用研究较少。目前仅见的研究主要包括:(1)上世纪60年代由临床心理学家 Rosenberg 开创的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该方案是一套调控行为与情绪的理论,旨在帮助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非暴力的沟通,以使个人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同时解决冲突和争端。近年来,该方案已经在政治冲突、家庭教育与服刑人员改造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45]。(2)群体间冲突(inter-group conflicts)及其解决研究。例如, Halperin 等以 500 名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为对象,研究了该群体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实验结果发现,经过训练,该群体可以产生对巴勒斯坦人(敌对方)的积极态度,进而更愿意为了和平而采取妥协。这说明了在群体冲突中固有的信念具有可塑性,也为推进中东和平提供了非暴力性的解决策略^[46]。因此,对非暴力的心理学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都将会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热点。

第五,强调非暴力心理学研究的生态与文化批判意识。非暴力问题带有强烈的文化关怀,但这种观念亟需摆脱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近来,已有研究者指出,“非暴力”或“和平”等话语方式需要个体克制那些可能导致直接伤害的暴力活动,其结果常造成消极行为、间接的杀戮以及对生态环境的随意破坏。因此,在 Brenes 的和平自我模型的基础上, Paige 和 Pim 等呼吁一种更具操作意义的非暴力和平文化观念——“无杀生”(Nonkilling)。“无杀生”强调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自我与他人、人类与社会、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安宁^[47]。当然,无杀生拒绝一切杀生行为(例如,死刑、杀生祭祀等等)的态度将会触及到社会文化与风俗、政治、法律与伦理规范等现实问题,这也为研究者反思非暴力的心理学根基留下更多空间。

参考文献:

- [1] Mayton D M, Burrows C A. Nonviolence, Psychology of[C]//In D. J. Christi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713-716.
- [2] Mayton D M. Nonviolence and Peace Psychology: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Societal, and World Peace[M]. New York: Springer, 2009: ix, 41-45.
- [3] Mattaini M A. Editorial: The Science of Nonviolence[J]. Behavior and Social Issues, 2002, 11: 100-104.
- [4] Sharp G, Paulson J.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M]. Manchester, NH: Extending Horizons Books, 2005: 12.
- [5] Holmes R L, Gan B L. (Eds.). Nonviol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M].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05: 56.
- [6] Greene M B. Reducing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in Schools[J].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2005, 6: 236-253.
- [7] Montiel C J.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Nonviolent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east Asia[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6, 62: 173-190.
- [8] Overmier J B. 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 Contribute to a Harmonious Society[J].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16: 673-678.
- [9] Mayton D M, Gay C K. Values, Nonviolence, and Peace Psychology[C]//In D. J. Christi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1158-1163.
- [10] Anderson A, Christie D J. Some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y to Policies Promoting Cultures of Peace[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001, 7: 173-185.
- [11] Deutsch M. William James: The First Peace Psychologist[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995, 1: 27-35.
- [12] Reis S L, Martin B.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Outrage Against Injustice[J]. Peace Research: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2008, 40(1): 5-23.
- [13]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 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M]. 吕文江,田嵩燕,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 [14] Carnagey N L, Anderson C A. The Effect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Affect, Cognition, and Behavior[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05, 16: 882-889.
- [15] Buchman D D, Funk J B. Video and Computer Games in the 90s: Children's Time Commitment and Game Preference[J]. Children Today, 1996, 24: 12-16.
- [16] Berkowitz L. On th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nger and Aggress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 45: 494-503.
- [17] Anderson C A, Bushman B J. Human Aggress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 27-51.
- [18] Brewer M B, Gaertner S L. Toward Reduction of Prejudice: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M]//In A. Tesser, et

- al.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group Processes (Vol. 3).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1: 451-472.
- [19] 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 49: 65-85.
- [20] Christie D J, Wagner R V, Winter D D. Peace, Conflict, and Violence: Peace Psych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Eds.)[M].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12-13.
- [21] Rudmin F W. Seventeen Early Peace Psychologists[J].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1, 31: 12-43.
- [22] Christie D J, Tint B, Wagner R V, et al. Peace Psychology for a Peaceful World[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8, 63: 540-552.
- [23] Kool V K. Toward a Theory of the Psychology of Nonviolence[C]//In V. K. Kool (Ed.), Nonviolenc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3: 1-24.
- [24] Kool V K. Psychology of Non-Violence and Aggress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4-26.
- [25] Sharp G.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M]. Boston, MA: Porter Sargent Books, 1973: 89.
- [26] Montiel J. Overview of Peace Psychology in Asia: Research, Practice, and Teaching[C]//In C. J. Montiel, N. M. Noor (Eds.), Peace Psychology in Asian. New York: Springer. 2009: 2-20.
- [27] Teixeira B. Nonviolent Theory and Practice[C]//In L. Kurtz (Ed.),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1999: 558-662.
- [28] Brenes A C. An Integral Model of Peace Education[C]//In A. L. Wenden (Ed.), Education for a Culture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77-98.
- [29] Weber T. Nonviolence Theory and Practice[C]//In L. Kurtz (Ed.),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Vol. 2, 2nd ed). Amsterdam: Elsevier, 2008: 1362-1372.
- [30] Farrell A D, Erwin E H. Individual Factors Influencing Effective Nonviolent Behavior and Fighting in Peer Situations: 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Urba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08, 37: 397-411.
- [31] Cavanagh T. Creating Schools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in a Time of War and Violence[J].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09, 8: 6-80.
- [32] Kool V K. People Power: Unarmed Resistance and Global Solidarity[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012, 18(1): 104-105.
- [33] Gibson S. Social Psychology, War and Peace: Towards a Critical Discursive Peace Psychology[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5: 239-250.
- [34] Floody D R.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eace Psychology[C]//In D. J. Christie (Ed.),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857-861.
- [35] Cohrs J C, Christie D J, White M P, et al. Contribu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Peace: Towards Global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3, 68(7): 590-600.
- [36] Porges E C, Decety J. Violence as a Source of Pleasure or Displeasure i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Nucleus Accumbens[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 7: 447.
- [37] 杨波,黄秀. 冷酷无情特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4):80-84
- [38] Kool V K. Applications of Gandhian Concepts in Psychology and Allied Disciplines[J].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3, 55 (Suppl 2): S235-S238.
- [39] Schultz W T.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 [40] Gibson, S. 'I'm not a War Monger but...':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ace Research[J].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22: 159-173.
- [41] Mayton D M, Susnjic S, Palmer B J,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Nonviolence: A review[J].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002, 8: 343-354.
- [42] French H W. Non-violence Self-inventory[EB/OL]. Retrieved July 15, 2010, from www.worldfaiths.org/articles/nonviolence.doc. 2004
- [43] Eckstein D, Grassa L L. The Non-viol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NVRQ)[J]. The Family Journ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for Couples and Families, 2005, 13: 205-211.
- [44] Blumberg H H, Hare A P, Costin A. Peace Psychology: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1-148
- [45] Marlow E, Nyamathi A, Grajeda W T, et al.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Training and Empathy in Male Parolees[J]. Journal of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2012, 18(1): 8-19.
- [46] Halperin E, Russell G A, Trzesniewski H K, et al. Promoting the Peace Process by Changing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J]. Science, 2011, 333: 1767-1769.
- [47] Mayton D M. The Psychology of Nonviolence and Nonkilling[C]//In. D. J. Christie & J. Pim (Eds.), Nonkilling Psychology. Honolulu: Center for Global Nonkilling, 2012: 341-360.

als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the core measure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apital critique. In this sense,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pital, effectively guide the harness of capital, and perfectly match the wealth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alloc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lan an overall road to the socialist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Chong-de(43)

The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s based on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The emphasis on 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 with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teacher's morality in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for teachers. The teachers' mor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contains rich contents, an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eacher's love of the occupation and devotion to the job, their love for the students, their meticulous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and their intended behaviors as an example for the students.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EN Shi-jian WANG Tao(52)

Since Julian proposed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hemes. Further developed by Cousin, Mann and Barnard,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has formed an important tradition in this field of studies. There i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on the theoretical building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Dual Function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Lower Class

GUO Yong-yu ZHOU Chun-yan(6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posi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ve in nature. On the one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more strongly in a just world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time and effort to their long-term goals, which would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moving up of lower-class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endorsemen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ight justify the status quo by their increased perception of justice, which in the long run would legitimate hierarchy inequality. To sum up, for lower clas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ays a dual function.

Nonviolence Psychology: History, Model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Wei PAN Wei HUANG Jia-yu(77)

Nonviolence is an action designed to exert influence on others so as to reach a goal without direct injury to those working against the achievement of a goal. It is not until the rise of peace psychology th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nonviolence sees some practical and adequate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models postulated by peace psychologis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violence, including Kool'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nonviolence, Teixeira's holistic theory of nonviolence, and Brenes' model of peaceful selfhood. In future research,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mprove its indigenization of measurement, encourage th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conduct more empirical studies into social life, and emphasize the eco-culture criticism.